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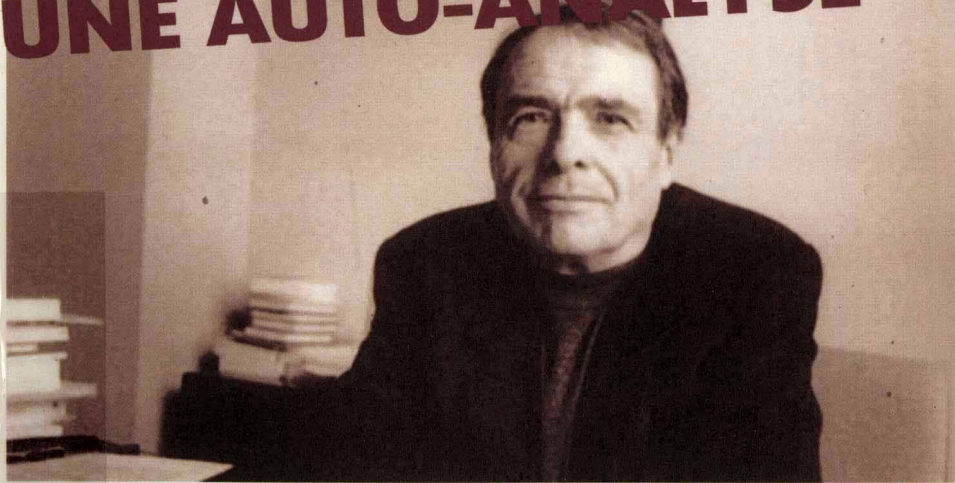
文化译品园
译介文化 传播文明


自我分析纲要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著
刘晖◎译

Pierre Bourdieu

ESQUISSE POUR UNE AUTO-ANALYSE.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文化译品园
译介文化 传播文明

ESQUISSE POUR UNE AUTO-ANALYSE

自我分析纲要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著

刘晖◎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 北京 ·

Esquisse pour une auto-analyse by Pierre Bourdieu
Copyright © Éditions Raisons d'Agir, février 2004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 2012 by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这不是传记。

——皮埃尔·布尔迪厄

出版社按语

社会学分析排除心理学，几个情绪变化除外。

——皮埃尔·布尔迪厄，《备课笔记》

布尔迪厄的这部著作撰写于2001年10月到12月间——但他多年以来致力于此并深思之，他尤其要思考适于赋予它的形式——，这部著作始于他在法兰西学院的最后课程，是按照《科学的科学与反思性》最后一章的一个（扩充的、修订的）新版本来设计的。而且，为了表明两部著作之间的连续性，他采用了相同的标题：“自我分析纲要”。他决定让

这本书首先在德国出版*，尽管他曾考虑把它重新拿来并加工成法文版。我们选择出版此书的德文版，仅仅补充了几个目录注释，以供明确参考。

- 8 如同（1982年）布尔迪厄以反思性很强的《关于课程的课程》进入法兰西学院那样，他决心让自己服从反思性的运用，以此作为最后的挑战，完成最后的课程。在他作为研究者的整个一生中，他都把反思性的运用当成科学研究的必要前提之一。

他知道，把自身作为对象可能带来这样的危险，即他不仅会被谴责为自满，也会为所有这些人提供武器，他们只等着一个机会，以便否定并正好以他的位置和他的轨迹的名义否定他的社会学的科学特点，他们看不到，反思性的运用长久以来被确立为一种科学性工具。这个方方面面自相矛盾的计划体现的远远不是炫耀行为（“督促读者思索为什么要读这个”，布尔迪厄在他的备课笔记中说），而是研究者与他关于科学真理的观念达成最终一致的

* *Ein Soziologischer Selbstversuch*, Frankfurt, Suhrkamp, 2002.

全新举动，以及通过相当克制的自省（“我把最客观的分析用来为最主观的服务”，他评论这部著作时还写道），为全部著作中陈述的主张之科学特点提供一种最终保证的意愿。

我们看到，他有理由担心它可能被恶意使用。⁹他在从前的一个版本中说：“这不是自传。我禁用这种体裁，不仅因为我揭示（露）了传记的幻想；它还让我极为反感，掺杂着恐惧的厌恶导致我泼许多‘传记作者’的冷水，这种厌恶源自我认为正当的理由。”

2003年12月

目 录

一
1

二
5

三
26

四
101

五
134

译后记
138

—

我不想迎合体裁，关于自传这种体裁多么俗套而又虚幻，我说得够多了。我只想尝试着集中并透露一种自我社会分析的几个因素。我不掩饰我的某些担忧，这些担忧远远超出对被误解的惯常恐惧。其实，我感到，特别由于我在社会空间中行程广泛，以及这种行程连接但不加以调和的诸社会世界在实践中的不相容，我不能保证——因为远远无法肯定我自己借助社会学工具是否达到了这一点——读者能以在我看来适宜的目光看待我将要展现的经验。

通过采取分析者的视角，我被迫（并使自己有

理由) 抓住所有从社会学观点来看直接相关的特征, 也就是对社会学解释和理解所必要的特征, 而且仅仅是这些特征。但是, 我远非人们所担心的那样, 试图强迫别人接受我的阐释, 并由此产生一种封闭作用。我试图把这种尽可能诚实地陈述的经验, 交付批判的对比, 就像涉及无论其他什么对象那样。我非常清楚, 我的历史的所有时刻, 尤其是在研究方面所采取的不同立场, 都经由这个视角并无论如何合宜地按照“慈善原则”得到分析, 这些时刻和立场可能显得恢复了其社会学必然性, 也就是说, 在这个方面得到了证明, 以及无论如何都显得比实际上更理性甚或更系统和更合理, 仿佛它们出自一个从一开始就有自我意识的计划。但是我知道并且丝毫不掩饰这一点, 即事实上, 我只是逐渐地发现指导我的实践的原则, 即使在研究领域也是如此。

我的“选择”并不真正是无意识的, 它们尤其体现在往往无关联的智识拒绝和反感中, 而且它们很迟才以明确的方式表现出来 (比如风行一时的对萨德的崇拜曾引起我的极度厌恶, 巴塔耶式或克洛

*Esquisse Pour une
auto-analyse*

索夫斯基式的性事观念仅在 1994 年《社会科学研究杂志》探讨“身体的交易”那一期才得到最初的表达)。也许因为我过分投入到我的研究工作和我主持的团队中，顾不上看我的四周；也许因为我要做的事太多，无法把我如此需要的一部分时间用来讨论或批判我周围那些在法国或外国、在社会科学或哲学领域最引人注目的人。我对他们一向是不大看重的，也许我在针对不属于我的问题的知识分子讨论中是相当笨拙和不受欢迎的 [我对与哈贝马斯的一次会面保留了一段好坏参半的回忆，这次会面当然是非常热情的，是德雷福斯 (Dreyfus) 和拉比诺 (Rabinow) 在巴黎安排的]，我趋向于一往直前，有点听其自然，我只是逐渐地，几乎总是以追溯的方式——尤其在国外短暂停留时——开始明确我与哈贝马斯、福柯或德里达的“区别”。今天人们经常向我问到他们，然而他们在我的研究中，比西考莱尔 (Cicourel)、拉博夫 (Labov)、达恩顿 (Darnton)、梯利 (Tilly)，以及其他许多在知识或传媒领域不知名的历史学家、人种学家或社会学家，出现得少得

多，而且更不重要。毕竟，我可以在解释自己和理解自己的努力中，依靠对自己的客观化片段，把这些片段留在整个研究过程的路途上。在这里，我将尽力深化它们，并把它们系统化。

*Esquisse Pour une
auto-analyse*

理解，就是首先理解一个场，一个人与这个场 15
一起并通过反对这个场而形成。这就是为什么要冒
欺骗读者的风险，因为读者也许期待看到我从开端
也就是通过展示我的早年经历和我童年的社会空间
开始，尽管如此，我还是应该按照正确的方法，首
先检验我在 20 世纪 50 年代左右进入场时场的状态。
如果我提醒人们，我当时是高等师范学校哲学专业
的学生，并在一个哲学可能表现辉煌的时代，处于
学校教育等级的顶端，在我看来，我应该说出了对
解释和理解我后来在大学场中的轨迹之需要所必要
的基本点。但是，鉴于“哲学家”这个词的模糊不

清有助于支持巨大的过度投入，而不那么犹豫和更直接符合真实机遇的选择则不考虑过度投入，那么，为了理解一个人为什么和如何变成“哲学家”，我也力求展现当时呈现给我的可能性空间，以及适于产生内在信心和灵启式赞同的制度仪式。在这些年中，这些是进入哲学家部落的条件。

在这里，我无法提示人们认可过程的全部机制，这个机制从预备班的中学高年级优等生会考到高等师范学校会考都存在，导致选民（以及尤其是逃过劫难的献身者）选择曾选择他们的学校，并认可把他们变成精英的选择标准；如同，接下来，导致他们趋向顶级学科，无疑他们得到的褒奖越多，他们选择这个方向就越迫切。一个人变成“哲学家”是因为他被认可，而且他通过为自己取得“哲学家”的权威地位认可自己。哲学选择因此是身份自信的一种表现，这种表现又强化了身份自信（或傲慢）。在这样一个时代尤其如此，因为在这个时代，整个知识场被让-保罗·萨特的形象统治着，尤其是通过

*Esquisse Pour une
auto-analyse*

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① 的收信人让·波弗莱 (Jean Beaufret) 以及高等师范学校本身的会考, 通过一度由莫里斯·梅洛-庞蒂和弗拉基米尔·扬科雷维奇 (Vladimir Jankélévitch) 组成的评委会, 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成为或可能表现为知识生活的圣地。

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是最高形式的也就是 17
哲学形式的法国式知识分子抱负诞生地。萨特刚刚创造并规定其形象的全能知识分子, 是一种教育要求的人, 这种教育提供了一系列广泛的学科, 哲学、文学、历史、古代和现代语言, 并通过“论述可知的万物”(按照涂尔干的说法) 的训练, 即整个配置的要点, 鼓励一种自信, 而这种自信往往近乎是对无可辩驳的无知的无意识。对修辞创造的无限权力的信仰, 只能在哲学即兴创作的巧妙戏剧化卖弄中得到最大的支持: 我想到了一些大师, 如米歇尔·亚历山大 (Michel Alexandre), 阿兰的晚期弟子, 他

^① Martin Heidegger, *Lettre sur l'humanisme*, Paris, Aubier, 1964.

以预言家的装腔作势掩盖了一种哲学话语的贫乏，这种哲学话语的唯一本领可归纳为一种无历史证明的思考，或许还有让·波弗莱，他向着迷的学生传授海德格尔的思想奥秘，除了几个片段，海德格尔的作品尚未被翻译。[人们只有看到这一点，即黑森林的哲学家作为职业贵族主义的典型代表，以及不
18 知不觉萦绕在哲学教授心头的无须争辩的哲学之哲学的典型代表，比表面看来更接近拉尼奥（Lagneau）和阿兰的法国古老传统——像 50 年代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培养的那么多“哲学家”能把对亚历山大的敬仰与对海德格尔的热情联系起来这个事实所证明的那样，海德格尔在法国获得的异乎寻常的成功得到了彻底的解释。]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被普遍承认的学校教育贵族，以及因“是贵族就要行为高尚”而来的高傲意识，这种意识为名副其实的“哲学家”规定最远大的知识抱负，禁止他致力于某些学科或某些研究对象，尤其是社会科学的专家接触的所有学科或对象。（比如，需要 1968 年的冲击，1945 年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

*Esquisse Pour une
auto-analyse*

班中培养出来的哲学家才能正视权力和政治问题，但只是以一种高度升华的方式：无疑，德勒兹和福柯以及他们之后的所有其他人，原本无法提出一个像权力问题那样明确地被旧式哲学标准排除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被学生的不满引入大学场的核心，学生的不满受到被学术正统观念完全忽视或蔑视的理论传统的启发，这些理论传统包括：马克思主义、韦伯的国家观念、学校教育制度的社会学分析。）

一些一体化程度很高的集团的极限（和实践模式）是因循守旧的家族，这些集团的影响力大部分来自这个事实，即它们被一种串通束缚在幻象中，¹⁹被一种固有的同谋束缚在集体幻觉中，这种串通或同谋为每个成员确保一种自我颂扬的经验，即一种团结一致的原则，这种团结一致植根于对集团形象的认同，集团形象即自我的迷人形象。其实，这种由社会构造的、来自一种“高级本质”的感觉，由于利益的一致和习性的相似，最有助于建立一种堪称“身体的精神”的东西——尽管这种表达方式用于坚信其完全的非实体性的一系列个体时显得这样